

出版与文化政治:新中国成立后的 上海出版公司

管若彤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出版力量较为薄弱,如何利用并改造数量庞大的私营出版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领域的重要工作,上海出版公司便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出版公司一方面延续此前的出版特色,着重出版美术、历史类书籍,另一方面探索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出版领域,比如在翻译工作中逐渐从西欧文学转向苏俄文学,同时承担了《鲁迅日记》《可爱的中国》等有重要政治意义书籍的影印工作。上海出版公司最终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这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的一个缩影。私营出版社的调整和选择,在经济形式上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生产的体制化特征,无疑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上海出版公司 改革 出版政策

DOI:10.19325/j.cnki.10-1176/g2.2025.01.010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新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相继展开。其中,出版工作不仅是市场行为,也关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出版业所生产的不是简单的商品,而主要是思想和政治的宣传品”^①。然而,社会历史沿革留下复杂多样的出版业情况,除了国营出版社,还有大量私营出版社存留。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在这一历史变动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私营出版业仍然有大量的书刊出版,呈现出和国营出版社不同的出版实践;另一方面,私营出版社在这一时期的变动和调整,也可以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变过程中窥见时代文化和文学的变迁。对私营出版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领域的重要工作,也构成了重建新中国文化和文学秩序这一历史任务的重要一环,并最终完成了出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型。

^①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宣传部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

一、“公司前途希望极大”:转折时代的上海出版公司的新机遇

上海出版公司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由柯灵与唐弢主编的政治性周刊《周报》、郑振铎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和施蛰存与周煦良主编的《活时代》三家杂志社合并扩建而成^①,刘哲民任总经理,钱家圭任经理,柯灵、唐弢主持编务。1950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刘哲民任董事长、秦鹤皋任经理、师陀任总编辑、郑振铎任监察人,主要出版文艺和学术书籍^②。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出版公司作为民主爱国作家、学者自发创办的出版公司,出版作品质量有保障,如《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郑振铎著《蛰居散记》等都有较高水平。但囿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上海出版公司一度面临经营绝境难以生存。在上海解放初期(约1951年)对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情况登记表格中,上海出版公司自述其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情况为“最先创刊政治性周刊《周报》,随后创刊《文艺复兴》以及陆续出版的《域外所藏古画集》、《鲁迅全集补遗》、《夜店》等,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在政治上有良好影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抄查威吓,无时不已。一九四六年秋,《周报》被迫停刊。《文艺复兴》时断时续。公司经此摧残,元气大损,惨淡经营,而争取民主坚持进步之立场,始终未变”^③。郑振铎也在1947年前后与刘哲民的通信中多次表示,虽然“预料销路可以不坏”“想来总不成问题”,但“每月即须付出二亿左右,而收入则日减一日,将来不知怎么办好”,甚至沦落至“负债累累”的境地^④。

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郑振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严重,在地下党安排下,郑振铎出走香港,后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此期间,郑振铎多次向刘哲民寄送书信,表明“出版事业实为最稳妥之投资”,“公司前途希望极大,决不趋时,而基础一定可以很稳固”,甚至认为“积极进行,希望极大,虽未必能和‘开明’、‘生活’并驾齐驱,但也可以不作第四家想也”^⑤。此时逐渐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在书信中表现出的态度转变,暗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关于私营出版社

①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4卷·抗日战争胜利与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③ 余嘉辑录:《建国初上海的书店出版社情况摘编(一)》,《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第117页。

④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⑤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4页。

发展道路走向的政策雏形。1949年10月4日,胡愈之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上的报告《全国出版事业概况》中指示,虽然“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出版事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出版事业的领导权必需操在人民政权管理下的国营出版业的手中”,但“我们力量较私营小,不能让私营和我们对立的发展,也不能排挤他们,让他们垮台,应该团结他们、领导他们,根据公私兼顾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生产的分工”^①。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策来看,国家对私营出版社的态度是“公私兼顾,分工合作”。《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的工作中心之三,是“建立和加强对全国公营与公私合营出版事业的联系与领导,并采取适当方式扶持私营出版事业,逐步建立在出版工作上的公私合作关系”^②。出版工作关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大计,在百废待兴之际尤为重要,但该时期财政力量不足、国营出版社势力弱、专业人才稀缺等一系列现实因素,使私营出版社拥有了必要的合法地位。“目前出版书籍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发行面不是太广而是太窄。国营出版发行机关包办不了,而且也不应包办。……而且许多历史较久的私营书店,在业务管理和出版技术方面都各有特长,为公营出版业所不及。因此为全局打算,维持并发展私营出版业是必要的。”^③

同时,私营出版社也迫切需要国家的扶持与帮助。伴随新政权的成立,“文艺生产已不是单纯的娱乐休闲行为,而是担负起教育群众的功能……因此被纳入整个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划中,不再是纯粹的个体性事业”^④,如何在新的社会形态下获得立足之处成为私营出版社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尽管国家政策承认了私营出版社的政治合法性,但社会大环境的发展趋势加速了国营出版社的壮大与私营出版社的受挫。1950年底,公营书店一般的书籍每种在一年内可销售一二万至四五万册,但私营书店出版的书,只能销售二三千至一万册,且新书出版种数很少,“两者对比,公营书店发展得快,私营书店营业萎缩”^⑤。郑振铎在1949年至1951年与刘哲民的往来书信中,虽然频繁表明“公司的前途希望一定很大”等积极态度,但上海出版公司存在的招股困难、资金周转不开等潜在危机仍然不容忽视。1950

①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全国出版事业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66页。

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出版事业中的公私关系和分工合作问题(胡署长在京津出版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④ 王秀涛:《宝文堂书店改革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通俗文艺生产》,《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

⑤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出版事业中的公私关系和分工合作问题(胡署长在京津出版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年,上海出版公司的基本工作除了对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修订外,主要是重印瞿秋白编并序《鲁迅杂感选集》、重印鲁迅编《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引玉集》等^①,成本高、收益少,收支严重不平衡。因此,国家的肯定与扶持,成为这一时期私营出版社存活发展的迫切需要。

总体来看,一方面,国营出版社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助私营出版社的专业力量;另一方面,私营出版社需要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稳定的政治合法性,从而获得新的资金和稿源支撑。因而,如开明书店、世界知识社、商务印书馆都陆续寻求政府帮助,改为公私合营^②。但是,“由于目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私营企业中还存在着散漫的不合理的情形,国家不应当亦不可能根据单纯的救济观点,对私营企业加以普遍的资助”^③,于是,如上海出版公司一般的具备专业能力和出版经验、政治上贴近新政权的小规模私营出版社,则走上了一条基于纯粹私营与公私合营之间的公私合作方式。

二、“面对人民的需要”:新的出版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综合国营经济的状况和出版业行业的内在差异,针对私营出版社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类:对于综合实力强且政治倾向明确的出版社如开明书店、世界知识社、商务印书馆等,国家予以资金支持,实现公私合营,以此巩固国营出版社势力;对于投机营利、作为反革命分子掩护的反动出版社,则坚决予以取缔;而对于以上海出版公司为代表的在解放前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且出版态度严肃的小型私营出版社,国家则采取了一种温和和过渡的公私合作方式,“各种专业出版社可按出版物性质对象,和有关政府机关或人民团体分别联系,并接受其领导,以确定编辑出版方针,并协助供给组织稿件”^④。上海出版公司(以下简称“上出”)在1950年至1955年的出版方式便是如此,其主要通过郑振铎、冯雪峰等人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以私营出版社的身份进行出版实践,走上了一条和新中国成立之前有所差异的出版道路。

①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4卷·抗日战争胜利与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出版总署最近调整若干私营出版业的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胡愈之署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526页。

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胡愈之署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页。

一方面,“上出”坚持原有的出版优势,试图保留之前自身的出版特色和专长。1949年底,郑振铎就曾致信刘哲民,表示关于出版计划,“着重在美术、考古及历史、辞典、字典方面,且可与新华、三联不发生冲突也”^①,1952年更是明确提出“公司出书计划,必须面对人民的需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自由主义’也。还是以美术、历史、图谱为主,这是无人可以竞争的”^②。上海出版公司坚持走美术、历史等专业出版路线,既与郑振铎本人的学术特长有关,也是新的出版格局之下的必然选择。在出版行业的发展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基本路线,如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中指出,“加强对私营出版业的管理。分别对象,采取积极的措施,对真正愿意为人民的出版事业而努力的力量,促使其联合经营或公私合营,确定其专业方向”^③,沈雁冰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开幕式讲话中也特别强调,“我们不分工就落后。因为这样的规模就不得不有三套资本,不能专业。什么书都出,大家都抢着销路好的书出,就必然造成一方面出书重复,一方面感到书缺乏”^④。郑振铎作为上海出版公司监察人,兼有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政治身份,其对上海出版公司出版计划的规划建议,也表明了在新的出版格局之下,民营出版社在和国营出版社的竞争中以差异化的方式寻求生存之道。

另一方面,“上出”也探寻新的出版项目,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的诉求,比如翻译作品的出版等。有学者认为,郑振铎与上海出版公司的翻译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呈现出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转变^⑤。从翻译学的角度说,“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在新中国的整合过程具有鲜明的“国家翻译实践”意义,它意味着“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实践活动或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⑥。上海出版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从以翻译西欧书籍为主转变为翻译苏俄书籍,如1949年推出李健吾编《高尔基戏剧集》,1950年郑振铎推出以苏俄文学为主体的“世界文学丛书”,并曾酝酿出版“世界短篇小说集”。为提高翻译苏俄文学作品的水平,“康嗣群主张成立一编辑委员会,除唐弢、李健吾、辛笛诸兄

①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②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沈雁冰副主任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3页。

⑤ 黄若泽:《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与上海出版公司的翻译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⑥ 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外语研究》2019年第4期。

外,尚须聘请章靳以诸兄(名义帮忙)”,除此之外,还聘请黄裳、巴金、陈西禾、楼适夷、汝龙、董秋斯、周熙良等名家操刀^①。

此外,通过郑振铎的努力,上海出版公司参与到与外交国礼事宜相关的出版事务中。1951年,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订购《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五百部^②,使此书一跃提升至国礼地位,上海出版公司也因此书获得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可,提高了社会声誉。但在《图录》的出版工作中,上海出版公司仅负责印刷工作,有关翻译、排版等事宜皆由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直接决定,并交由郑振铎转达。1952年4月,郑振铎代表上海出版公司从出版物的美观得体角度出发,认为“对外联络局的《图录》,每页要印三种文字,实为困难,且不美观。最好仍只印‘中文’,目录用俄英两种文字。如此,查起来也不至不方便也”,但当月就遭到对外联络局否定,表示“每图说明还是用三种文字印出,不管好看不好看”。同年6月,对外联络局又连续更改要求,最终将原本要求的外文说明另附一页,以供紧急送礼之用^③。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又先后承担了具有国家工程意味的图书《楚辞集注》《楚辞图》《八十七神仙卷》的影印工作^④。郑振铎更是在书信中明确强调了此类影印工作的政治属性,“这是一个政治任务,盼你能够予以大力协助,完成此举”^⑤。

上海出版公司另有两部代表性的出版物是《鲁迅日记》与《可爱的中国》。《鲁迅日记》最早从1938年12月1日起在《文汇报晚刊》头版专栏的位置每日连载^⑥,最初发表的时候读者非常多,但不久以后,有些读者就失望了:“简单,平凡,既不‘浪漫风流’,也不‘慷慨激昂’,洋场才子,前进青年,各无所得,远不如看‘艺坛消息’来得有趣。”^⑦直至1939年,柯灵发表于《鲁迅风》的文章《关于〈鲁迅日记〉》,使社会重拾对《鲁迅日记》的重视。《鲁迅日记》首要是其史料价值,许广平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一文详细讲述了鲁迅病中仍然坚持写日记的具体情况^⑧,侧面表现出《鲁迅日记》不同于鲁迅其他著作,更具有真实性、客观性。1950年10月,许广平向中央报告有关鲁迅出版社业务

①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②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③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5、153页。

④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78页。

⑤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⑥ 程振兴:《鲁迅日记的命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⑦ 柯灵:《关于〈鲁迅日记〉》,《鲁迅风》1939年第5期。

⑧ 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回忆宋庆龄》,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90—193页。

情况及目前困难,“愿将该出版社结束,以后鲁迅先生著作版权无条件捐献国家”^①。同月,出版总署发布《出版总署为鲁迅先生著作编选、翻译、印行事的通告》,“自1950年10月19日起,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凡欲编选、翻译或印行鲁迅先生著作而以公开出售为目的者,应于事前获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同意”^②。自此,鲁迅著作被纳入到中国的出版规划中,成为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资源。

上海出版公司影印《鲁迅日记》得益于冯雪峰、郑振铎、方行、唐弢等人的中间介绍。方行因郑振铎组织《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时与刘哲民相识,解放后二人接触较多。在谈到上海出版公司出书困难时,方行建议应先和许广平先生商量把《鲁迅日记》影印出来,对此唐弢、柯灵都予以认可。此时,鲁迅著作并不是可以随意出版的,故刘哲民致信郑振铎,托他在北京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申请与授权。经许广平同意及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上海出版公司通过唐弢联系到在上海新成立的鲁迅著作编刊社负责人冯雪峰。出版《鲁迅日记》不是普通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政治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溢出了出版领域,就像冯雪峰在与刘哲民的第一次会晤中说,“《鲁迅日记》的出版,是解放后第一部鲁迅手迹,是有政治意义的,一定要把它印好,对这部书的发行,希望不要作营利打算,书价不宜抬高”,许广平也表示,“《鲁迅日记》的出版不支取版税,为了赠送中央领导和亲友,要求赠书多一些(后来赠书定为三十五部)。再则希望出版公司作为文化任务,书价除成本外不加手续费”^③。由于《鲁迅日记》定价不含利润,其发行也由新华书店特批由上海出版公司自行发行,以减少亏损。影印版《鲁迅日记》最终多流入国家机关、图书馆、文化研究机构,大大提高了上海出版公司的社会和政治声誉。

另一本《可爱的中国》同样是通过冯雪峰介绍交由上海出版公司进行影印的。《可爱的中国》是中共革命烈士方志敏的遗稿,记录了其在南昌监狱中的见闻与感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不屈的意志,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烈士遗稿在解放前几经辗转,解放后,谢澹如把他所保存的烈士全部遗稿交给冯雪峰^④。在刘哲民与许广平、冯雪峰、周建人夫妇、方行、柯灵、唐弢、秦鹤皋等商谈《鲁迅日记》影印出版工作的晚餐会终席前,冯雪峰谈到了方

①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关于鲁迅先生著作出版事座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页。

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出版总署为鲁迅先生著作编选、翻译、印行事的通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34页。

③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辑:《〈鲁迅日记〉的影印工作》,《出版史料》第二辑,1983年,第92—96页。

④ 项立岭、罗义俊:《〈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送及版本新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一稿,认为在将这部文稿上交中央革命博物馆之前,可以先影印出版几千册,作为给方志敏烈士的战友和亲属的一种可贵的纪念品^①。在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后,冯雪峰将文稿交由上海出版公司负责,把《清贫》《可爱的中国》《遗信》编成一册,以《可爱的中国》为书名,影印三千册出版。根据刘哲民回忆,“影印本三千册发行后,不胫而走,一售而空”^②。鉴于此书在社会层面产生的良好影响,195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为范本,用铅字排印出版了《可爱的中国》^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旧政权的交替为上海出版公司这样的私营出版社提供了变革的历史契机和挑战,这些私营出版社在试图维持原有出版特色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出版领域,并在新的环境下得以发展。然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道路,意味着私营经济并不在新中国未来的规划中,寻求转型和出路成为它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历史的必然选择:并入新文艺出版社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鉴于国家整体形势对私营出版社持肯定与支持态度,但私营出版社内部状况非常复杂,部分私营出版社存在的问题和带来的社会危害愈发严重。陈克寒在检查华东地区出版业情况时表示,“解放以来,上海的私营出版业一直是发展的,其中以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全年发展得最快,现在来登记的出版社好多都说是那时成立的”,有些私营出版社一本万利,质量良莠不齐,总编辑、经理“或系青红帮流氓,或系过去办黄色方块小报的文棍,或系专门以敲竹杆为生的老枪记者,或系失业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如文化汉奸等”,一无知识的童装女裁缝也竟申请办理出版业^④。逐利而来的私营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大多是抄袭而成,有些甚至对国家政策法规乱作解释。这些出版社很显然和被取缔的对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海出版公司这一类的出版社面向时代和人民需要开展出版业务,政治上清白,社会声誉向来较好,自然会成为改造、利用的对象,因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出版事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出版事业的领导权必需操在人民政

①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可爱的中国〉的印行》,《出版史料》第一辑,1982年,第116页。

②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可爱的中国〉的印行》,《出版史料》第一辑,1982年,第116页。

③ 阳:《〈可爱的中国〉的版本》,《出版史料》1982年第1期。

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陈克寒检查华东、中南出版工作致有关部门及负责人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权管理下的国营出版业的手中”^①,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上海出版公司也最终走向公私合营。

1952年,郑振铎在与刘哲民的书信中就已提出,“上海出版公司必须打算作‘结束’,或改为‘合营’,或与其他出版社合并,私人出版事业,将来是不应该有的”^②。起初上海出版公司欲与平明、文光等书店合营,但遭到郑振铎否定,认为几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的性质不同,后提出与晨光出版社合并,但进展一度搁置。至1952年8月,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郑振铎又一次提出“或可考虑‘公私合营’的计划,我当向‘人民美术出版社’提议”^③,但上海出版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计划一直模棱两可。直至1953年初,郑振铎在信中明确且严肃地表明“出版事业一定是首先走上国营(社会主义的)的道路”^④,并于1954年帮助上海出版公司联系,拟加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后续因各方原因未能实现)。

郑振铎对上海出版公司发展计划的改变,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一方面,上海出版公司本身即面临着稿源缺乏、人才流失等困境。自1950年以后,除了《鲁迅日记》《可爱的中国》两版重要但非盈利的影印出版物之外,上海出版公司基本没有新的稿源,多为重印或承接政府分配下来的印刷工作。1952年公司更是面临在师陀辞职后无人接任主持编辑部事宜的窘境,作为上海出版公司主心骨的刘哲民也在同年年底计划离职。可见,在着力承担社会责任、以政治正确为根本导向的经营理念下,上海出版公司作为私营出版社已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对于私营出版社的政策持续收紧。1953年出版总署颁布《出版总署第一次出版建设五年计划》,明确要求加强对私营出版企业的管理和指导,提出要实现五年后出版事业基本由国家掌握^⑤。为加快实现出版行业“一五计划”,国家在纸张、广告等多个与出版经营相关联的行业中对私营加以限制,以控制利润从而抑制私营进一步扩张。1954年《中共中央批发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指出,“对于已核准营业而出版态度又比较严肃的私营出版社,由出版行政机关审核其出版计划,酌情配给纸张,规定书籍的定价标准”^⑥,该规定从纸张供给方面切断了私营出版社扩张

①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全国出版事业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②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③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④ 郑振铎著,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⑤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出版总署第一次出版建设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⑥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批发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的可能性。同年《出版总署关于整顿上海私营出版业方案的意见复华东新闻出版局函》则要求“今后国营报刊可考虑以未经核准营业为理由,对第二、第三类私营出版社的广告,一律不予刊登”,认为报刊对公营的和私营的出版社及正当的和投机的出版社的广告在排列地位与收费标准上没有或很少有区别是不应该的;该文件同时限制了对私营出版社的贷款,“对第二、第三类出版社,应通知银行,以未经核准营业为理由,一律不给贷款”^①。以上举措充分显现出国家对私营出版社在政策上的约束和限制。

1955年底,迫于公司内部经营困境与外界压力,上海出版公司最终并入由多家私营出版社组成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早在1953年底颁布的《整顿上海私营出版业方案》中就有提及将上海出版公司吸收至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方案,“吸收条件较好的私营出版社13家参加下列原有的公私合营出版社:(1)新文艺出版社吸收3家:1.文化生活出版社,2.平明出版社……3.上海出版公司……”^②但因上海出版公司一度可能被吸收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一再推迟。至此,上海出版公司结束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七年的经营,从私营转变为公私合营,融入到新的出版格局中,上海曾繁盛一时的私营出版社也陆续以新的身份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8月,最初由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图书公司合并组成,是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自成立初就被要求“把改造私营出版社作为自己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③。伴随新群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光明书局、上海出版公司等大量私营出版社的加入,势力不断扩大,至1959年7月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文艺出版社,真正成为上海地区的出版中心,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出版业长期存在的分散复杂局面。

出版行业的“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就此止步。文化部出版局出于计划经济的考虑,针对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选题有严格考量,凡是“重复的选题都不予通过”,这造成南北两个出版中心之间存在大量矛盾。针对两社之间的关系,国家多次尝试协调,如要求“双方应互相交换每年的选题计划,并作必要的调整,互派代表参加必要的会议,互相交换稿件、内部刊物及工作总结,以便能更好地互相配合,并交流经验”^④等,但效果甚微。

①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出版总署关于整顿上海私营出版业方案的意见复华东新闻出版局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整顿上海私营出版业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③ 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宣传部改进文学和美术出版工作会议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两社之争也可视为 50 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从上海向北京的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上海拥有的出版资源和传统,使得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计划经济框架无法一下子建立。”^①陆定一在上海休养期间了解到上海出版方面对两社矛盾的抱怨后表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事业,应当力量统一起来做工作,不宜如此竞争,互相抵消。既如此,我们索性把出版工作大一统起来,统到北京,上海各社为分社,不就没有这些问题了。”^②1964 年 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并的通知》正式下发,上海文艺出版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体现了当代文学出版的计划化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生产的机制。

四、结 语

上海出版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出版社的典型代表,它从私营出版社过渡为公私合营的过程是当时许多私营出版社的缩影。在从解放前迈向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原有的私营出版社需要在新政权、新社会下寻找生存的空间,并利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私营出版社的合法性地位,在充分发挥原有历史资源优势的同时,开辟出新的出版空间,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下人民出版事业的要求,努力向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靠拢。上海出版公司等私营出版社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抓住历史过渡时期的出版空间,取得了不俗的出版成绩。在这一过程中,私营出版社的过往历史表现、出版社负责人如郑振铎的个人身份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私营经济已不再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合法性,以不同的方式转向国营经济的身份成为必然选择。考察以上海出版公司为代表的私营出版社在这一时期的调整 and 选择,对认识“现代”向“当代”的转向,以及“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向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出版机构在经济形式上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生产的体制化特征,无疑也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内涵。

[作者管若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24 级硕士研究生]

① 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2019 年第 2 期。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藏档案。转引自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的前前后后》一文。

Publishing and Culture Politics: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an Ruoto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te-owned publishing industry was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Assimil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publishing houses became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cultural field, with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being one of the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continued its previous publishing focus on fine arts and history books, while also exploring new are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shift in translation priorities from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 to Russian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undertook the photocopy work of books with political significance such as *Lu Xun's Diary* and *Lovely Motherland*. Eventually,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merged into Shanghai New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hich could be seen as a microcosm of the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The adjustment and choice of private publishing houses to be unified with the economic model to some extent determined the institutionalized natur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undoubtedly forming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words: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reform, publishing policy